
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吕耀东

内容提要：政治右倾化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容或目标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有着“同一性”特征，且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实施政治右倾化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理念含有民族主义成分，进一步证实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具有民族主义特质。日本保守势力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体现为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言行，并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及政策方针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政治右倾化 民族主义 保守主义 日本自民党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4) 03-0001-20

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益显现民族主义特质。当前日本保守政党奉行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适时与日本盛行的民族主义形成“政治共鸣”，在以“自由主义史观”、“爱国心”及传统文化等方式粉饰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同时，力求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达到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不断推动“正常国家论”所言的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特别是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演绎出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内政和外交。日本政治右倾化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将长期左右 21 世纪日本的政治局面及国家发展战略走向。

一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要素

在日本盛行的民族主义氛围中，日本政党格局的总体保守化，必然加速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日本政治右倾化是执政的保守政党及其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外化，亦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质。

(一) 从政党政治格局来看,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和平主义与左翼政治思潮式微,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成分得以迅速提升

就日本日益突出的“右倾化”政治现象,有学者分析指出:“日本的右派,当然是针对左派而言的。”“保守也就是针对革新而言的。”^① 右派(或右翼)坚持“传统权威、民族主义”等观点,左派(或左翼)奉行“平等主义、合理主义”等理念^②,两者在现实政治层面,表现为“重整军备、修改宪法第九条”与“反战、和平主义和捍卫宪法第九条”等观点的对立和斗争。这样,通过“左”和“右”的相对性,可以导出日本革新政党与保守政党的对立以及此消彼长形成的“右倾化”政治格局。

日本前众议院长河野洋平曾就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现象表示:“切身感受到整个政界都在右倾。在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庭抗礼的时代,双方势均力敌,政治基本是中庸的。如今那样的平衡已完全被打破。”他还指出,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的议论之声高涨,强调“爱国心”的主张越来越强烈,这都是右倾化的表现。^③ 这样的观点既说明了自民党及其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张扬,也明确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政治右倾化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④

当今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特质,表现为纵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以否认甚至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提振“爱国心”、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及修宪谋求“正常国家化”、以领土主权纠纷及价值观外交遏制中国等等,引起日本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日本学者安井裕司曾指出,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在第46届众议院总选举时就表示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将自卫队改国防军。自民党获294席,加上改宪派日本维新会的议席比率超过三分之二,使得在随后参议院选举中继续改宪议题成为可能,因此所谓‘右倾化’的说法是没有错的”。^⑤ 又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赞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右倾化”政策

① 邓红:《谈谈日本的“右倾”与保守化问题》,《中国评论》2000年6月号。

② 浅羽通明『右翼と左翼』、幻冬舎、2006年、43頁。

③ <http://china.kyodo.co.jp/2004/sekai/20040429-204.html>。

④ 参见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⑤ 「日本の政治は『右傾化』しているのか?『保守化』しているのか?それとも『ナショナリズム』なのか?」、<http://www.quon.asia/yomimono/business/global/2012/12/22/3762.php>。

的同时，也强调“用民族主义包装这些政策是错误的，损害了安倍自身的立场”。他还指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做出修改‘河野谈话’的姿态涉及历史问题，会使中国和韩国想起战前的日本而感到不安，应该停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① 诸如此类的评论，比较直观地说明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日本政治右倾化作为日本社会的一种政治思潮，与其对立的是日本左翼政治思潮与和平主义，与其相近的有新保守主义、新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② 这表明日本政治右倾化含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成分。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就是执政的保守政党及其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体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现象。

(二) 从理论及政治实践来看，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右倾化”有着内在联系，即日本政治右倾化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要素

当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大体体现为“正常国家论”所言及的对于民族或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大国化战略构想。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③ 民族性及民族主义是当代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突出表征和本质特性。在日本，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常常被理解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解读。一般来讲，“民族”(nation)一词，含有“国家”和“民族”两方面含义，其中“国家”的含义要高于“民族”，且更强调政治特点。也就是说，是“国家”需要“民族”这样一种概念来确定疆土、人口和主权。所以，“国家”和“民族”在概念上紧密相关，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民族包含有现代国家这一政治制度的含义”，尤为重要，“民族”是有自己的国家或者是自治程度高、高度政治化的族群(ethnic group)。^④ 民族国家是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⑤ 因此，“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民族主义是一种试图把民族等同于国家的运动。他们认为如果民族与国家之间没有这种紧密的结合，民族主义就几

①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4/04/73342.html>.

② 参见刘江永、王新生等：《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中日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③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④ 参见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刘克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

⑤ 参见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乎没有社会或政治意义”。正所谓“民族主义是政治上的需要”。^①

所以，要把握现代世界中民族主义的特质，“必须要从文化到政治、从历史性文化共同体到公民的民族国家”等多角度分析。^②从政治实践来看，民族主义往往是通过国家的“认同或依托”来关注民族利益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执政党对待本国的民族主义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将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手段却是常有的。在日本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以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弘扬“民族精神”，恢复昔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言行，这对于急于摆脱“战后体制”、恢复“正常国家”形态的日本保守势力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政治借口，因此不断演绎出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右倾化言行及政治现象。

（三）从日本政治变迁过程来看，日本的民族主义有着独特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过程

日本的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日本学者小熊英二认为，日本的“所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指国家（或民族）范畴内，持有一种‘我们’意识的现象。近代以前的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原则上人们拥有的只是由血统规定下的身份，再加上住处是固定的，人们很难拥有这种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的‘我们’意识。……明治时期日本的知识分子，为了对抗来自欧美的殖民地化威胁，曾反复论及如何使人们持有‘我们’、‘日本人’这种意识”。可以说，这是日本真正的民族主义觉悟，并且是给日本带来国家（或民族）近代化的根本动力。这种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大大促进了共通且同一的‘日本文化’的形成。这不仅局限在只是灌输给人们天皇崇拜和国家忠诚的意识形态水平上，而是意味着‘文化’自身的改观”。^③对于日本民族主义的如此文化解读，事实上也包含着浓烈的政治意味，因为日本国民的“天皇崇拜和国家忠诚”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在论及“民族主义的弱点”时指出：“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④可以说，

① 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30、185页。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③ 小熊英二：《全球化与日本的民族主义》，载林振江、梁云祥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日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9、20页。

④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61.

日本民族主义从产生伊始就与“天皇崇拜和国家忠诚”的政治目的密切相关。历史事实证明，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动力没有修成“正果”，最终走上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邪路，并堕落为战后以弘扬所谓“传统文化”、“民族气魄”来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政治的、极端的民族主义。

（四）从日本政治思潮发展过程来看，激进的民族主义逐步展现出排外言论盛行、“皇国史观”复活、力图修改和平宪法及重建政治军事大国等政治现象

长期以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否认甚至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的言行，逐渐弥漫到学术界、政界和舆论界，引起“日本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爆发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日本学者川村范行将现阶段日本的民族主义分为四种类型：（1）朝鲜发射导弹引发的、对抗来自其他快速发展国家威胁的民族主义；（2）针对中国和韩国对其历史问题的批判，否定自虐史观、肯定过去的战争的民族主义；（3）爱国甚至强制性爱国比个人尊重更优先的民族主义；（4）主张日本文化优越性的民族主义。其中，上述第一、二种类型是排外的民族主义，第三、四种类型是加强日本统一性的民族主义。^① 这样“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日本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合流，演化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在动力。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凯杜里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所言：“若一种诸如民族主义这样的学说的确控制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政治领导人，他们将按照这一学说的原则行动。”^② 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充分利用了“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实现其政治目的，并严重助长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导致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逐渐向参拜靖国神社“合理化”的方向发展。^③ 对此，有日本学者批评道：“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应主要作为政治问题考虑，应该作为包括日本的整个亚洲的问题来进行批评。”^④ 但是，保守派政要麻生太郎却煽动扩大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态，妄称基于靖国神社供奉的许多亡灵生前是高呼“天皇万岁”而赴死的，因而天皇应该前往参拜。^⑤

① 参见川村范行：《从日中友好到战略互惠——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克服和战后和解》，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7年，第5页。

② 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③ 参见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318页。

④ 依田憲家：《日中关系的问题点》，《中日关系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⑤ 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幻冬舎、2007年、307頁。

2013 年 12 月，安倍晋三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严重违背了日本政府就侵略历史向亚洲各国人民进行反省的承诺，这种行为是对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但是，安倍晋三却为自己的“历史观”辩解：“所谓历史，是不能简单地用善、恶来划分的……百年、千年来，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产生、形成的传统为何得以保存下来？对此常有真知灼见，这才是保守主义的精神。”^① 这种在保持日本“民族传统”借口下，对日本保守主义的历史误读，正是其助长极端民族主义、否认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政治右倾化表现。

二 日本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政治右倾化

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根源于保守政党及其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的彰显，而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亦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内涵。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义往往是民族主义的“依托”或载体。

（一）民族主义是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应有之义”

中曾根康弘曾在《新的保守理论》一书中就将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融汇于自己的政治理念之中。他指出：“保守是守什么？首先，我们要保卫日本美丽的大自然和日本领土；第二，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第三，保护自由的市场经济；第四，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这就是我所说的保守主义。”他进一步解释说：“有时‘保守’被人误解为固守现状，墨守现行体制的‘守旧’想法。然而，我指出要卫护的四根支柱中，第二条和第四条，有守旧思想的人是绝对不会亮出来的。”^②

具体来说，中曾根康弘的“保守主义”是要“保守”“日本领土”、“民族气魄”及“生活价值”等日本的“民族性”。可以说，中曾根康弘所表达的“保守主义”是包含民族主义特定内涵的思想和主张。他对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赋予了“创新”的内涵。中曾根保守和张扬日本的“民族性”，力求恢复日本往昔的“辉煌”和“自信”，甚至毫不掩饰明治维新时

①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年、27頁。

② 中曾根康弘：《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

期的对外侵略扩张。^①可以看出,中曾根所言的第二条和第四条,正是要保守日本的民族性和“民族气魄”,弘扬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我们姑且说第二条“保卫日本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价值”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范畴,但第四条关于“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积极的民族气魄”的表述,明确体现出日本民族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20世纪后期,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日本的中曾根政府都是新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中曾根在任职的五年中,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密切联系,堪称推行世界性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三驾马车”。在西方学者看来,中曾根执政时期的日本“新保守主义不但看到了日本历史上长期的追赶阶段的终结,它也宣布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此日本将更加依靠其自身的文化资源来决定国家的进步”。中曾根力求以新保守主义理念谋求“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教育、社会目标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②日本新保守主义“是以承认日本现代化运动追赶阶段的结束和认定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告终开始的”。^③事实上,中曾根的《新的保守理论》就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宣言,他所标榜的保守主义体现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特质。

(二) 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必然显现为政治右倾化的言行及政策

日本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的运动方针明确指出:“我党在21世纪要谋求实行健全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新旧保守主义在民族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是一致的,均标榜重视文化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但保守主义和其他政治思潮及理念相类似,“必然是以多种面貌出现”。“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生活方式”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保守主义。^④各个国家的保守主义具有建立在保守主义“共性”之上的“民族特色”,是各国

① 日本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神化天皇的绝对权威。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在对外关系方面,明治初年随着国力日渐增强,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90年代中期起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② 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世界七大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③ 肯尼思·派尔:《日本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力与目标》,台北:金禾出版社,1985年,第77、79页。

④ 参见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意》,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特殊的政治文化、政治传统和思维形式的具体表现。

日本的保守主义与欧美的保守主义相比较，它在重视对于自然、传统文化、宗教和历史等保守主义共性的同时，格外关注民族主义的政治符号，奉行“政治的保守主义”。^① 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对保守主义精神的肯定，并不是基于对保守主义作哲学的抽象，而是基于对日本现实社会的判断、选择和构想”，可概括为“天皇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和“秩序主义”。其中，“天皇主义”是“自民党强调保持传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持天皇权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天皇制是日本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可以说是日本保守主义的重要支柱。“国家主义”是要“强化日本国家的主导地位和权力，从而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对国民都具有很强统制力与统合力的国家”。“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②

不难看出，这里的“天皇主义”、“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日本保守主义的“个性”内涵，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尽管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均认同“国家主义”，但是，前者主张国家在维护等级和秩序、捍卫传统和历史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国家对个人的意义，即个人的权力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得以真正地实现；后者则更强调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统合力”，加强国民对于天皇的权威认同、“爱国心”和“卫国的气概”的社会性教育。为此，自民党内部分人提出了天皇元首化、年号法制化、靖国神社国营化、“日之丸”国旗与“君之代”国歌法定化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并且逐渐促其实现，从而力求使天皇所代表的“秩序与传统”能长久地作用和影响日本社会。可以说，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使得“天皇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现实主义论调下，必然会纵容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

^① 日本学者北冈勋认为，日本的保守主义体系是经历了自然的保守主义、初始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的保守主义三个发展阶段演变而来的。首先，从日本的疆土归于统一到幕藩体制终结为自然的保守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是基于人性生存本能的抗拒现状改变的观念体现，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人性存在。其次，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是初始的保守主义时期。初始的保守主义源于自然的保守主义，根植于日本的政治及社会现实之中。它与此后出现的政治的保守主义相比，反省或自觉程度较低。再者，日本战败以来属于政治的保守主义时代。政治的保守主义又称现代保守主义，是以现代社会为背景的高度反省或自觉。它“表现出与战后破坏性革命风潮相对抗，并内化于与革新政党相对立的保守政党的纲领及政策之中的特性”。可见，日本的保守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充分反映出其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完善的过程。参见：北冈勋『日本保守主義』、御茶の水書房、1992年、81頁。

^② 参见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2~262页。

（三）自民党及其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表现出强烈民族主义特质

在日本，作为战后保守政党思想和主张的政治的保守主义，并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来表现，而是通过具体的党的纲领和章程来体现，通过具体的政策方针和保守主义的路线来实现。在自民党“七大”提出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要纲》中指出：“所谓保守主义，是指积极地保持优良的传统和秩序，清除邪恶，力求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在秩序之中求取进步，摒弃破坏性的急进主义，也不信守只拘泥于过去和现在的反动保守主义。”^①其中，“保持优良的传统和秩序”，与欧美传统的保守主义虽在表面具有相同性，但这里的所谓“传统和秩序”，当然是指日本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对于“天皇主义”的民族主义认同。所谓“破坏性的急进主义”，更多的是指当时与自民党相对立的、维护和平宪法和反对日美安保体制的革新派——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自民党对“保守主义”的解释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冷战色彩。目前，“不信守只拘泥于过去和现在”，就是自民党希望改变“非正常国家”现状的“反动”。“自民党运动方针”明确指出，自民党在21世纪要谋求的保守主义绝不是维持现状，保守主义往往是一个寻求改革的主义。这表明作为保守主义政党的自民党大有将“正常国家化”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在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氛围中，民族主义情绪内化于日本政坛主流保守派政治家的言行之中。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战后总决算”和“正常国家论”，正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从日本保守政党的政治实践来看，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实质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点的。日本的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正在奉行着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和主张。这是当代日本政治的一种客观现实存在。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现行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与民族主义有着历史的、逻辑的相关性。在一些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看来，二战战败使日本丧失了自身延续已久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和“国家观”。^②历史事实表明，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就具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特征。军国主义就是在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中膨胀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战败后，日本“侵略和掠夺别国和民族”的国家对外职能被部分剥夺。为了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否

① 北岡勲『日本保守主義』、49頁、70頁。

② 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年、193頁。

认日本的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谋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和修改和平宪法等就成为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共识。

(四)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与“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互为实现手段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常常借助“民族主义”实现其政治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指出：“有些人认为‘对于还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思想，而对于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民族而言，民族主义则是保守思想’。”^① 安倍晋三借他人观点阐述民族主义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同时也表明了安倍自己关于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的理解，即认可“民族主义是保守思想”的观点。这明确地道出安倍等保守派政治家所奉行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民族主义特质。

近年来，自民党把具有民族主义内涵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及政策方针，主动迎合日本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民意”，导致否认和美化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等方面的言行大肆盛行，使得极端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蔓延开来，并对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及政治环境造成深刻的影响。譬如，日本《产经新闻》评论员安村廉就日本政治决策提出自己的保守主义理念及看法：“在我看来，保守主义可以解释为是推行这样一种政治：重视已被纳入日本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智慧与秩序，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因此，当然必须尊重中庸的历史观。它也有纠正极度近视的缺乏平衡的历史观的作用。”^②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如今已经逐步演化为“历史修正主义”的强势“民意”，成为日本保守势力政治决策的重要依据。在所谓“尊重中庸的历史观”方面，安倍晋三在回忆外祖父——甲级战犯岸信介时予以运用：“我从小就知道外公被称为‘保守反动的权力化身’、‘政界的黑幕’，也曾有人说‘你外公是甲级战犯嫌疑犯’。出于抵触，我反而对‘保守’一词产生了亲近感。”^③

上述这些言论，充分表现出民族主义就是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应有之义”。采取迎合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强化国家主义、纵容“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等言行，是当代日本保守主义执政理念的突出特征。面对日本社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日本主流保守派政治家不是通过理性的政策引导，而是认同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甚至

①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98頁。

② 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573页。

③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18頁。

与极端民族主义相互利用，导致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不断加深。

三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成因

关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学界有观点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日本民族主义产生深刻影响。但日本的政治现实明确显示，日本经济大国化、社会文化变迁及政府行为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及引导作用巨大，尤其是日本保守政党及其保守主义执政理念显现的民族主义倾向。这说明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有着民族主义的內因。

（一）日本老牌保守派政治家大多扮演民族主义的启发者角色

日本在二战中惨败，使得其曾经“激进高昂”的民族主义迅速被和平主义所取代。但是，随着美国因冷战改变对日政策，“日本人对‘民族’、‘国民’和‘国家’的集体认同，在1955年以后发生了本质变化”^①。尽管二战后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暂时淹没在和平主义思潮之中，却因鸠山一郎和岸信介等老牌保守派政要的蛊惑而有所萌动。曾经滋生日本军国主义温床的“皇国史观”适时死灰复燃。一批旧军人、旧外交官乃至战犯，以撰写历史著作、回忆录、传记、秘录以及发表日记、手记等学术研究为幌子，否认甚至美化殖民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繁荣与所谓“民族虚无”饱受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诟病”，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武士道式”的自杀行为，标志着极端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社会“反动”。三岛由纪夫在生前曾表示，日本人的自我只能从日本的文化中发现，而正统文化的唯一源泉在于天皇。^②他在《文化防卫论》中表达的民族主义核心是主张建立战后天皇的军事统治权体制并形成民族共同体，以及建设日本整体性文化体系。^③他这种渴望回到战前的“文化妄想”和极端行为，对当时的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文化震惊”。

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经济大国的地位给了日本更多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优越感，并激发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复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适时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策主张，充分迎合了日本民族主义者追求“政治

①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公共性—、新曜社、2003年、11頁、12頁。

② 参见约翰·内森：《无约束的日本》，周小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③ 参见纪廷许：《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70页。

军事大国”梦想的心理渴求。80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地位、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动，加之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经济成就的赞誉，使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复苏，“一亿总中流”意识使日本国民的大国主义意识不断增强，因战败形成的和平主义意识淡化，并逐渐认可了以日美安保体制“借船出海”的现实存在。日本不再甘心安于只是经济大国的现状，渴望成为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大国，重新登上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政治舞台。1985 年，中曾根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政治大国化”论、“不沉的航空母舰”论、“从战后解脱出来”等新保守主义理念，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日渐显著。^①

“为了克服日本人在遭到战败、占领和国际谴责之后而自承负面形象，中曾根试图用培养民族自尊和理解他国传统之间的平衡以转变民族意识。”^②在中曾根看来，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扩大国际开发援助，要努力成为政治大国。同时，他主张大力培养日本国民的“国防意识”、“爱国心”和民族意识，重新确立国家权威，不断增强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分量。特别是中曾根突出“爱国心”、民族意识，成为不同于英美新保守主义的鲜明特点。可以说，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就是力求通过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来重塑日本的“民族精神”。

在中曾根看来，二战后的教育改革忽视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国民“爱国心”的教育，需要对二战以来的教育进行深刻反省和改革。对此，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指出：在日本国内，“从群众的反应来看，中曾根的吸引力的秘密就在于他唤起潜在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的能力”。“中曾根确信，自信必须从理解传统体制和历史开始。”参拜靖国神社，“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方式以撇开那场战争，使之不在成为国家的耻辱和窘迫之源，重新回到崇奉战争亡灵的传统”。派尔质疑中曾根有煽动民族主义的动机：“重塑民族性也是很艰难的，因为思想和行为的旧习惯是难以根绝的。要达到中曾根所提倡的那种开放、均衡、自由的国家主义，就需要改掉用老眼光看待世界的旧方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本能和偏狭地抬高日本民族。”^③但是，加强日本民族认同，

①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 新赤版（1021）、岩波書店、2006 年、173 頁。

② 肯尼思·派尔：《日本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力与目标》，第 114～115 页。

③ 同上书，第 77 页。

诉诸否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已经成为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群体迎合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手段。中曾根试图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以克服他认为的、战时的记忆所造成的不断恶化的后果。然而，日本的集体认同并没有被富有开创性的世界主义或宽容的民族主义所取代^①，他这种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爱国心”，演变为通过审定教科书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结果，助长了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形成了对日本内政外交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二）冷战后形成的民族主义“正常国家论”，导致政治右倾化日渐加强

冷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国际局势变化，为日本迎来“第三次开国”。而“开国”的含义带有一定的“革命性”^②，这无疑也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极好契机。冷战后，“1955年体制”的崩溃，导致革新政党的衰落和保守政党的不断壮大，日本政治开始了“总体保守化”。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总体保守化’后所表现出来的新民族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有很大不同：第一，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把正视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之为‘自虐史观’，意欲描绘更加‘舒服’的近代史。第二，对和平宪法、民主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战后’进行改写。他们公然提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③这一观点表明了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内涵扩大为在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基础上，试图修改“战后体制”赋予日本的“和平宪法”及其第九条。“新民族主义”持“自由主义史观”，主张强化国家观念。“新民族主义”的生成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它直接作用于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左右国内社会政治生活，对外交政策也产生重大影响。^④随之，日本保守主义执政理念在国家发展目标等重大战略层面，表现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右倾化趋势。

在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看来，自民党主流派在战后所奉行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日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迈进，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小泽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中，全面阐述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正常国家论”。在国内政治改革层面，小泽一郎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

① 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第35页。

② 松本健一『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筑摩書房、2010年、8頁、20頁。

③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 新赤版（1021）、173頁。

④ 参见杨伯江：《当前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

他认为：“宪法当然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① 日本“现行宪法中，没有关于与国际环境对应的明确规定”，所以“围绕宪法的解释”进行着“没有结果的争论”。首先，可在宪法第九条的两项中附加第三项，确定为“前两项不妨碍为了创造和平而进行活动的自卫队可派赴海外”；其次，“保持宪法现状，制定一部‘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规定作为一切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让日本拥有个别自卫权，为此，确保自卫队为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拥有作为联合国一员积极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权利”。在对外关系层面，小泽一郎认为，日本“同美国、欧洲并列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日本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日本有义务对“世界做贡献”。小泽主张要摆脱战败国地位，使日本成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正常国家”，在国际上发挥与自己国家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他主张把自卫队的“专守防卫战略”改为推行“创造和平战略”，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发挥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作用。^②

可以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已内化到现在日本的保守主义政策之中，对内实现修改“和平宪法”、对外实现“正常国家”成为日本保守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潜移默化地变为日本保守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要求在国际上拥有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是日本保守主义政党的政治理想。日本战后经济的巨大成功，使长期被压抑的民族主义及大国意识不断增强，为了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日本保守政党积极迎合日本国内日益盛行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

在小渊惠三内阁时期，小渊首相表面上没有专门谈论保守主义问题，但采取了迎合民族主义的实践行动，他与小泽一郎联手通过“国歌国旗法案”，切实贯彻落实了迎合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执政理念和路线。

（三）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承接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致使政治右倾化不断升级

进入 21 世纪，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就开始全面否认和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小泉纯一郎无视亚洲殖民及军国主义受害民众的强烈抗议，以首相身份连年参拜靖国神社，以否认侵略历史的行动迎合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随后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等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观”隐患日益显现。

①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 年、124 頁。

②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123～125 頁、16 頁、110 頁、119 頁。

安倍“继承了岸的遗传基因固然是一个方面，比起经济主义的话题，他更热衷于修改教育基本法和修改宪法”^①。他力图以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增强日本国民“爱国心”和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目标。安倍等人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宣扬“民族主义”言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生于战后的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未能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

右翼政治世家的思想传承，导致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错误“历史观”。出身于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深受其外祖父、“鹰派”首相岸信介的影响。岸信介因其二战侵华罪行，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获释后仍念念不忘“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1957~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期间，他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其言行受到当时日本“和平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安倍晋三却不以为然，他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回忆道：“从幼年时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而且，他能毅然面对社会上喧嚣的非难，其泰然处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为之感到自豪。”^②这说明，安倍对于岸信介政治思想的承接与认同。安倍本人也确认：“由于是在外公、父亲都是政治家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长期耳濡目染，我与同辈人相比总还是对‘国家’有更多的意识。”^③可以说，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等要素，决定了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和政治右倾化言行。

日本极右翼势力的言行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是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实施政治右倾化的社会动因。冷战后，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人鼓吹“自由主义史观”论调，大肆抨击日本战后以来所有的历史结论及历史教育为“反日史观”和“自虐史观”，指责这样的历史观使日本人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要求“还原”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现代史。在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下，安倍等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观及其政治右倾化日趋显露，并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可以说，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及政治右倾化言行绝非偶然，既是日本的“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等社会思潮泛滥所致，又是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环境与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个体因素结合的时代产物。

如今，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十分明确。在安倍内阁的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中，大多赞同“自由主义

① 御厨贵「戦後保守政治家の思想的系譜」、「中央公論」2007年2月号。

②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24頁。

③ 同上书，第19頁。

史观”，并屡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安倍的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的历史观，也表达了大多数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的“共同心声”。安倍认为，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向为我们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达尊崇的心情”。安倍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认为“‘甲级战犯’存在着误解”，“因为战犯在国内法上不是罪犯”。^① 安倍力求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政治右倾化行为，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表达其摆脱“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

四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趋向

从长远来看，日本保守势力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将继续体现为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言行，并在日本政界形成影响政府决策及政策方针的重要因素。激化与邻国的领土纠纷、力求修改和平宪法和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等政治右倾化言行，将长期影响未来日本的内外政策走向。

（一）政治右倾化及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力促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化目标

安倍谋求摆脱“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对于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跨党派的。多数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与部分民主党国会议员等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在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方面有着共同话语和高度共识。尤其涉及国家、宪法、防卫等敏感政治问题时，他们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实现日美同盟的对等性、争取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等方面都能取得相当一致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常常把否认侵略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相结合，力求通过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构想，并在“争常”、修宪、派兵海外及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上，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民族主义政治立场。

（二）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理念将深刻影响日本对外关系及外交战略

日本在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战略目标。这使得日本保守派政要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理念在处理国际

^①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69～71頁。

事务中日益“右倾化”。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中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他将“国际责任”作为日本“自身的安全、独立和生存”的要件，抛弃“吉田路线”，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确立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构想，明确了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的长远目标。日本的“正常国家论”就是日本要在国际“安全保障”及国际贡献等领域“有所作为”，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作用。这才是日本追求的国家最高层次的战略目标。“正常国家论”谋求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改变军事上的自我约束，摆脱“战后体制”，力求重获对外动用军事手段的权利，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目标。

（三）政治右倾化思潮及错误历史观将继续否认和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事实

在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看来，21世纪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体表现为“拒绝反省战前外交，谴责中国、韩国，专注于历史认识、领土等问题”的“赞美战前型民粹主义”。2012年12月底，再次就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向《产经新闻》透露，将通过听取专家意见等重新检证有关二战时期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此言一出，美国《纽约时报》（2013年1月3日）就此发表题为《试图重新否认历史》的社论，批评安倍晋三计划通过专家重新检证“河野谈话”的做法是个“严重的错误”，将安倍晋三定义为“右翼民族主义者”，并称安倍晋三“试图否认战争犯罪，减轻谢罪程度等行为，势必激怒韩国、中国、菲律宾等在战时因日本的野蛮行径蒙受苦痛的国家”。对此，执政的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荻生田光一辩解道：“如果在检证日本政府承认强制征集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后发现新的事实的情况下，不排除发表新的谈话。”这表明日本右翼及保守势力否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既定路线是不容易改变的。^①但是，正如日本学者米原谦所指出：“安倍所依靠的右翼民族主义是国内消费用的，难以在国际上通行。”^②安倍等保守派政要的这种伤害广大亚洲受害国的民族感情的政治右倾化言行，已经引起了亚洲国家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① 安倍晋三2014年3月14日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安倍内阁不会考虑修改承认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事实的“河野谈话”。日本媒体指出，安倍在“河野谈话”等历史认识问题上暂时改变口风，旨在缓和来自美国等方面的压力，为摆脱当前外交困境创造条件。参见2014年3月15日新华社电。

^② 米原谦：《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崔世广译，《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

(四) 随着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加剧, 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将日益凸显

对于日本“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形势, 日本政治家加藤纮一将其分为对抗的民族主义、竞争的民族主义和理想的民族主义三种类型。其中, “对抗的民族主义, 主要就是和周边国家、邻国进行争斗, 那就是领土问题, 把它点燃的话, 可能在政治上很有人气, 但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定会引火烧身”^①。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思潮中逐步占据上风, 并助长了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一些保守派政治家利用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大开方便之门, 制造与周边国家的“岛争”主权纠纷, 不断纵容、放任“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屡次审定通过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教科书, 将极端民族主义的观点变成否认“历史问题”的实际行动。2012 年 9 月 10 日, 日本政府公然恶化中日关系, 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 实施所谓“国有化”, 拉开日本深化钓鱼岛“国有化”的政治过程。

随后, 日本各保守政党将钓鱼岛问题写入众议院大选的政纲, 竞相展现政治右倾化言论。自民党的竞选纲领提出, “将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和稳定管理, 调整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的政策, 并将讨论在该岛上常驻公务人员, 改善周边渔业环境等”。民主党选举纲领表示, 将扩充海上保安厅等警备体制, 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保卫日本的领土和领海。以极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为党首的日本维新会在众院选举“政策框架 2013~2016”中, 公然宣称对钓鱼岛要强化“实际占领”。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创立, 进一步加剧日本的政治右倾化。

安倍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修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 力图摆脱“战后体制”意愿十分明确。安倍立志要制定一部符合保守势力意愿的“新宪法”, 完成自民党尚未完成的“立党”使命。在安倍看来, 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 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2012 年和 2013 年的众参两院选举重新确立保守政党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优势, 获得众参议院半数以上席位的自民党已将修改和平宪法提速, 加之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大家党和新党改革等修宪势力的壮大,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将愈加凸显。

(五) 政治右倾化言行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并影响和毒化日本社会, 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

针对安倍“民族主义”色彩的执政理念及政治右倾化言行, 澳大利亚学者

^① 《全球视野下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 2012 年第八届北京—东京论坛会刊, 中国日报社, 第 65 页。

加文·麦考马克指出：“实际上他的政治声望建立在历史修正主义、否认战争责任的立场之上。”^① 这揭露了安倍等保守派政治家煽动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目的。安倍和麻生等保守派政要不断散布否认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论的同时，也严重误导了日本社会及社会群体对于日本近现代史上“功过是非”的价值判断。譬如，2014年2月4日，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的“知览特攻和平会馆”竟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邮寄申请书，希望将该会馆收藏的333件敢死队队员遗书等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种公然将作为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敢死队队员遗书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恶劣行为表明，日本社会对于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并没有深刻反省，且有颠倒黑白的价值误判。又据日本共同社2014年3月1日报道，就东京多家公立图书馆馆藏的有关记述纳粹迫害的《安妮日记》及相关书籍遭蓄意破坏一事，国际舆论认为日本社会已经呈现“保守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执政的保守势力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肆意泛滥提供政治气候，后者为前者的政治右倾化言行摇旗呐喊。如今这两股势力遥相呼应，甚至公然合流，导致日本国内的政治右倾化日趋严重，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总之，随着自民党保守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延续，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将会愈加凸显。近来，安倍晋三等保守派政治家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改恶”和参拜靖国神社风波中，从迎合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发展到走向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前台。安倍上台前口口声声称首要问题就是改善日本经济现状，但执政后却在安全保障、外交和历史认识问题等方面加快右倾化步伐，不仅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扬言修改反省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而且大搞密室政治，强行出台有损日本民众知情权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安倍等保守派政要在政治右倾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安倍再次上台后悍然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更是从极端民族主义的“依靠者”变成直接参与者。在他的政治右倾化言行带动下，部分内阁成员已经从过去的“失言”变成现在的“直言”，甚至是直接行动，把否认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作为谋取“政绩”的“卖点”，表现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右倾化趋向。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目的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

^① 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能，最终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因而，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修宪、“争常”并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构想，就成为日本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政治主题。如果安倍等保守派政要继续在历史认识和靖国神社问题上做出错误言行，必然会影响到未来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如果在强调“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对于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不加反省地“肯定”和美化，就会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乃至无法确立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国际形象。

但是，目前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的事实证明，以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制造与邻国领土纠纷和修宪等方式追求所谓“正常国家”，乃至谋求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已经成为安倍等保守势力的终极政治理想。从长远来看，日本的保守势力迎合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右倾化步伐是不会停歇的。

The Nation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Political Right-deviation

Lu Yaodong

Japanese political right-deviation is the historical outcome of the conservative trend of Japanese politics. The content and target of Japanese political right-deviation shares great similarity with the political pursuit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The conservative philosophy held by rul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Japan, which are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ight-deviation, includes elements of nationalism. It proves that Japanese political right-deviation has nationalist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ervative philosophy held by Japanese conservatives is manifested as discourse and conduct relating to political right-deviation and nationalism, which poses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 and policies.

日本政治右傾化の民族主義の特質について

呂耀東

政治右傾化は、日本政壇において総体保守化の歴史の必然的な成り行きである。日本政治右傾化の内容または目標は、日本の民族主義の政治訴えと同じ特徴をもっているし、与党の保守政党による政治右傾化を支える保守主義理念に民族主義の要素もある故、日本政治右傾化に民族主義の特質があることを立証している。日本の保守勢力の保守主義政治理念は政治右傾化及びその民族主義言行に現れ、政治過程において政府の政策決定及び政策方針に影響を及ぼす重要な要素である。

(责任编辑：李璇夏)